

第三编 全民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第七章 团结抗战抗击反共逆流

第一节 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与“儒家巷事件”

1938年10月，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本基本上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固守占领区，然后逐渐把兵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在此前后，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动，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出于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对抗战的态度发生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充当汉奸，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日益明显，逐步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飭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明确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全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要求国民党停止各种限制、排挤、污蔑、迫害抗日部队和共产党的行为。

当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活动时，中共广东省委对应付突然事变、巩固党的组织等问题，已有所讨论和准备。省委决定将广东各地反共高潮的情况，迅速向各地党组织通报，以提高警惕，严防突变，并确定以巩固党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立即行动把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同时在政治宣传上坚持抗战，强调团结，加强统战工作，加强对进步分子的联络，加强《新华南》刊物的宣传战斗性，以鼓励人民群众的斗争。1939年7月上旬，省委再次讨论时局问题，重申巩固党组织和反逆流斗争，要求各群众团体在动乱中站稳立场，坚定

工作信心，在困难环境中保持原有工作基础，巩固合法地位，实行活动形式大转变。同年11月7日，省委在韶关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制定了政治上进攻，组织上严密，以及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组织等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要求克服右的倾向和防止“左”的言行。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高潮以及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而是针锋相对地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大革命时期片面强调对国民党迁就退让，否认斗争，结果在反革命的进攻面前遭到重大损失的惨痛教训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使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

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很快波及广东南路及钦廉地区，合浦发生的“儒家巷事件”，是广东党组织恢复重建以来县级领导机关遭遇的第一次破坏。

在合浦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抗日运动和进步势力更加蓬勃发展，令国民党合浦当局震惊，认为这一定是共产党从中组织和领导造成的，于是加快反共步伐。国民党合浦当局采取了跟踪、监视、密报等特务手段，密切注意着中共的动向。

1939年2月，李士洋任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后，认为原县委机关所在地的房子破旧，经多次选择，确定迁到廉州墟地街儒家巷蔡屋他舅父家的一碉楼里。他不按照秘密工作条例秘密地居住和处理好党的文件，让很多人随便出入，引起了人们的注目。1939年清明节以后，原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曾和陈任生谈过恋爱的护士叶惠清，从韶关到廉州找陈任生，她没有组织介绍信，属于来历不明的人，按秘密工纪律，这种人是不能知道和来到领导机关的，但李士洋却毫无原则地接她到县委机关居住。叶惠清打扮得十分时髦，烫头发、穿旗袍、涂口红、穿高跟鞋，在廉州这个地方很惹人注目。当时，国民党一七五师驻廉州，青年军官要找对象，常到街上物色女青年，见到叶惠清，就盯上紧迫，追到儒家巷蔡屋，发现这个地方异常，有的人怀疑她是私娼，有的人怀疑她是日本间谍，就派便衣持续监视。情报科科长罗宝湖向师长莫树杰报告，说发现嫌疑秘密机关，莫树杰即下令搜捕。

事情发生前，在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任秘书的庞达，就送了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给李士洋等人看过，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他没有改变原来的状态。事发前两天，李士洋通知陈任生和李英敏去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反共文件，决定迅速清理文件和笔记，撤退暴露人员，县委机关搬到农村，在县委等待分配工作的张九匡、利培源尽快离开。但会后李士洋没有执行，既不清理文件又不撤退人员，仍然保持原状。

1939年6月16日晚上11时，罗宝湖和参谋陈泽民（陈浙民）带特务连一个排包围蔡屋，以查户口为名，叫开门突击搜查。罗、陈二人进屋后，把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叶惠清5人集中到三楼派兵看守，两人逐层严密搜查，在三楼李士洋床下的一个藤箱中搜出几本油印的《党的建设》和一本传达中共六中全会和广东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精神的记录本，还在其他地方搜出一批抗日救亡书刊。在问讯中，李士洋等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罗、陈二人派便衣把五人在原地囚禁起来，带着搜到的文件和问话记录离去。

两三天后，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广东省第八区专署专员邓世增，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国民党一七五师军法处长廖克勤、参谋处长曾乃勤，由罗宝湖、陈泽民陪同，到蔡屋三楼逐一审讯被囚禁的李士洋等5人。李士洋、陈任生等提出强硬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但未获准。两三个星期后，又有三四个国民党一七五师军官前来，提出要被捕人员在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办理自首手续，才能释放，李、陈等人严词拒绝。随后，合浦地区国民党当局和一七五师发电向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和桂林行营白崇禧请示，但两处都未答复，事情便拖下来。

一个多月后，师部将被捕的5人押解到国民党一〇四六团团部关押，后又转送到武利国民党一七五师师部。1939年9月，国民党一七五师调离钦廉，便将他们寄监在设于石塘钟秀岩（石洞）的灵山县监狱。在那里囚禁时，党组织曾几次组织人带衣服、食物等去慰问。

1940年3月，日军自钦县向灵山攻击，进逼石塘。此时石塘钟秀岩监狱附近机枪大炮声密集，监狱的负责人和守狱人员仓皇逃遁，陈任生等5人便和狱中的其他囚徒一起破门而出。他们逃出后，先潜到谢王岗的家乡福旺镇脚村（今属浦北县）隐蔽，再转到卢壁光家乡枫木村住，然后通过那里的群众关系，先联系上谢王岗，通过谢王岗联系上合浦县委和南路特委组织。陈任生等5人从合浦县城被捕至灵山县石塘钟秀岩逃出的全部过程中，一直跟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始终没有说过有损于党组织的话，没有泄露过党的秘密。

在县委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庞达和赵世尧通知余下的县委委员开会，商讨对策，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被捕党员的表现，在基本情况弄清楚后，派张进煊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作了汇报。1940年，经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反复审查，认为发生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县委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反共实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没有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致思想上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没有切实清理和处理好的文件，工作上违背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最终导致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儒家巷事件”的发生，也暴露了合浦党组织领导上的重大缺点：党的工作重点在城市，在上层和知识分子中，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工农出身的党员太少，农村（北部山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存在着幻想和依赖心理。

“儒家巷事件”后，国民党当局从搜到的文件中，知道抗日先锋队是党的外围组织，林增华和周胜皋忙辞去抗先总队的队长和副总队长职务。国民党当局下令强行解散合浦抗日先锋队，接着解散各救亡团体，在学校禁止学生组织读书会，不准阅读进步书刊和开展抗日活动，开除进步学生，加强反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特务的活动，使合浦的抗日

运动一度消沉下去。

“儒家巷事件”后，县委原委员韩瑶初、龙门负责人李卓兴等一些害怕动摇，自行退党。

第二节 县委金街会议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县委金街扩大会议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后，县委常委张进煊向上级汇报县委被破坏的经过以及从国民党专署、一七五师政治部等处得来的材料，被捕人员在国民党审讯时的口供及表现等情况。中共广东省委经过审查和研究，于1939年8月，派温焯华到合浦白石水区金街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心县委常委张进煊，委员赵世尧、李英敏，还有各地的党员骨干谢王岗、朱明、邹贞业、陈业昌、郭芳、庞达、张书坚、黄模、李秋等，张世聪、岑月英列席听了报告。张进煊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①温焯华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合浦“儒家巷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而很多人却存在右倾麻痹思想，没有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不作斗争，不敢斗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反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倒行逆施，要敢于和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作斗争。②总结中心县委工作及县委领导机关被破坏的教训。检讨县委前段主要是在城市和青年学生中做一些华而不实的工作，没有深入到农民和农村去打好基础，地区既小，又缺乏实力，遇到国民党反共时就陷入被动，县委遭到破坏主要是由于县委领导人存在右倾麻痹思想，对国民党的反共毫无警觉，严重违反秘密工作纪律所致。③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山区农村。安排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到白石水、小江等山区和到灵、钦、防等县的农村开展工作，开拓农村阵地，为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条件，县委领导机关迁到白石水区。④整顿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县委机关被破坏后，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消极退党，说明党的队伍不够坚强，需要整顿教育，巩固组织。同时，党的队伍还不够强大，还要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和外县要努力发展。⑤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的县工委（仍领导钦廉四属）。新选出的县工委委员有张进煊、谢王岗、朱明、李英敏，张进煊任书记，谢王岗任组织部部长，朱明任宣传部部长。领导决定派赵世尧去粤北参加省委办的学习班，并向省委详细报告合浦情况及本次会议的决定。

合浦县委领导机关的恢复和党组织的整顿，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反汪反逆流斗争中的领导力量，为抗击国民党反共逆流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新的合浦县工委成立后，陆续成立各区区委和特别支部：中共白石水区委员会，书记李英敏；西场区委员会，书记黄模；公馆区委员会，书记邹贞业；小江区委员会，书记李

秋。中共北海特别支部，书记郭芳；寨圩特别支部，书记陈业昌。10月，成立中共廉北区委员会，书记庞达，组织委员郭芳，宣传委员庞自。

1939年9月，合浦县工委派党员邓松利用他是八区专员邓世增的侄子受邓世增器重的关系，打入八区专员公署做秘密工作，初任赈济区事务员，不久，任南路游击指挥部译电员兼监印。他的任务是收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向党组织汇报。他以灰色的面目出现，不参加社会活动，跟党的领导人单线联系。

邓松在专署收集送给党组织的情报主要有：①日军在钦州、防城登陆和占领雷州半岛的情况；②国民党秘密颁布的反共法令；③国民党党政特开会的“党工作汇报”的反共内容；④各县顽固派报来的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情况；⑤专署和合浦县府“进剿”白石水人民的计划和部署，每次进攻时间、兵力和进军路线等。这些情报对保护党的组织，开展反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起到重要的作用。

农村阵地的开拓

1938年9月，日军首次进占濠洲岛，合浦成为抗日前线。为了开辟合北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合浦特支推动廉中和合浦一中迁校小江，并派朱兰清、许家骅、邱鸿就到白石水地区柑子根小学教书，建立支部。10月，又派从广州回来的张世聪回白石水区，任支部书记。随后陆续调一些党员到该区，在农村中发展党员。但是，党的工作重心仍在城镇，以学生为主。

1939年6月，“儒家巷事件”后，当年8月举行的县委扩大会议才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山区农村，大量调派党员干部到白石水、小江等地山区开展农村工作，县委领导机关也迁到白石水区。

白石水区的农村工作。张世聪是从广州回来的大学生，回到白石水后，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都很器重他，公推他任白石水中心小学、东馆小学、金街小学、红岭小学四所小学的校长，教师全部由他聘任。县领导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先后派了20多名党员和进步分子到这些小学任教。白石水中心小学党员有曾德才、刘胜英、岑培祥、曾国才等，东馆小学党员有岑月英、罗德崇、蔡琳等，金街小学党员有伍雍娴、李华良、利培凤等，红岭小学党员有邱成绩、罗人迎、何若之（何正三）、刘子明、俞永贞等，柑子根小学党员有王克、卢冠群等。另调吴之澍到茅坡小学任教。有3个党员以上的小学都建立支部，对周围农村的农民开展工作。他们在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搞好生产中，以办夜校，认亲戚，结姐妹，组织同心会、兄弟会、壮丁会等形式，团结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宣传、阶级教育，建立农民武装。

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挑选有觉悟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贫苦农民，查清没有政治问题（面目清楚），即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党的政策、党员标准、党的纪律、

革命气节及秘密工作等教育，成熟后个别吸收。但是，也有些人工作粗糙，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只凭表示坚决革命不怕死，愿意入党的即吸收入党，有一天连续发展3个党员。这样，很快在柑子根、东馆、金街、红岭的周围村庄发展黄池江、黄玉昌、叶梓才、黄家祚、黄家禄、包积威等一批农民入党和在小学教师中吸收陈克刚（陈秉琨）、朱菊清、张世柏等入党。到1940年春，入党农民达60多名，知识分子4名。

新发展的农民出身的党员绝大多数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为革命而献身。但是，由于有些地方要求过急，教育不够深入，以致有少部分入党的人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日军、地主、官僚的仇恨而参加革命，只认识到打日本，打倒地主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和反动政府，对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党的纲领政策、革命前途等缺乏认识。虽然也经过教育，但没有放在心上，或说不清楚，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

1939年7月，白石水区成立区委，辖区中心在大成一带，西至灵南文利香山，东至张黄，南至勒鸡水，北至北通。区委书记李英敏，组织委员岑月英，宣传委员邱成绩（岑月英调离后任组织委员），统战委员张世聪（后为军事委员）、王克（岑月英离开后任宣传委员）。后来增加农民出身的黄池光为委员。区委下辖4个支部，2个特组，1个两人小组及个别人。到1940年初，各支部负责人及党员分布如下。

柑子根支部。支部书记王克（其前任是许家骅，已调往灵山），党员有朱兰清、邱鸿就、卢冠群、朱菊清、叶梓才夫妇、黄和富、钟应廷（钟二哥）、钟念潮（钟大伯）、朱玉光、王玄光、李辉臣夫妇、朱玉林、王希文、朱恒山、叶玉堂、朱桂清、朱锦清、朱渭清、朱桂芳、朱五哥、朱六哥、朱秋臣、黄锡纲、王梓华、赖玉钦、庞家世、黄宝扬、郑绍兴、黄在文、叶四哥、叶五哥、叶七哥、叶九哥、吴顶兴、包金华、包节华、包观庭等。

东馆（勾刀水）支部。支部书记岑月英（兼），党员有罗德崇、蔡琳、张世柏、张世瑶、黄池江、黄家禄、黄玉昌夫妇、黄福华、赖源祥、张体宽、张燮芳、张体春、张广生、张永丰、张体康、黄喜政、黄超海、刘胜英（从白石水小学调来）等。

金街支部。支部书记伍雍娴，党员有李华良、曾德才（1939年12月从白石水小学调来任支部书记，伍雍娴、李华良调往高州）、利培凤（1940年春调来任支部书记，曾德才改任组织委员）、陈克刚、赖桂臣、赖华臣、赖源金、郑广隆、郑广隆弟、赖源章、赖源传、赖德华、郑绍棠等。

红岭支部。支部书记邱成绩（兼），党员有罗人迎、何若之、刘子明、俞永贞、包积威、包积强、包积孙、陈国兴、朱步清等。

白石水特组。组长曾德才，党员有刘胜英、岑培祥、曾国才（岑、曾两人不久调回廉州）。1939年12月，因发生国民党白石水乡长梁文光调戏刘胜英（不遂）及多方刁难曾德才、刘胜英的事，区委决定分别调她们到金街和东馆小学，白石水圩上遂无党组织。

茅坪特组。组长吴之澍。

北通社根村井边麓有党员 2 人：张之辉、张若梅（兄妹）。

灵南文利香山小学有何正四 1 人。

总计有党员 90 多人。其中农民出身的 60 多人，知识分子 27 人，外来党员 21 人（包括李华良、伍雍娴、许家骅、岑培祥、曾国才等），其他都是本地党员。

这些支部、小组分布在白石水、旧州、北通、文利四个乡数十个村庄，团结了数以千计的贫苦农民，党组织在这些村中深深扎下根基。与此同时，张世聪积极做好张姓开明绅士张景斋、张金声等人的团结教育工作；朱兰清做好国民党旧州乡乡长吴国本、乡队副吴国宝的统战工作，争取旧州乡自卫大队武装，其后出任旧州乡副乡长。这就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武装斗争打下牢固的基础。白石水区的工作得到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人和合浦中心县委的表扬。

白石水区武装自卫斗争发生后，区委和党组织发生很大的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出兵镇压后，李英敏、岑月英等外来干部大多调走；邱成绩害怕动摇离去，黄池光因和钟应廷到张黄接县委交通员被乡兵围捕，钟应廷投江牺牲，黄池江回来后，组织怀疑他有问题，停职审查。区委改组，由王克任区委书记，黄玉昌任组织委员，卢文任宣传委员。1941 年 3 月，县委调走王克，任命卢文为区委书记，黄玉昌为组织委员，陈祥军为宣传委员。地方干部陈克刚、朱菊清等也因暴露外调，党员大部分分地区单线联系。

小江区的农村工作。1938 年冬至 1939 年春，廉中和合浦一中分别迁校小江圩和长塘山后，学校中的党组织经常派人到附近农村做宣传组织工作，但都没有在农村中发展党员，未能深入扎根。

1939 年夏，谢王岗、宋家培、李山高中毕业后，分别回到老家福旺镇脚、小江宋屋、龙门做农民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岑嘉毅也到龙门工作。

1939 年秋，廉中总支书记李秋根据县委指示，召集学校各支部书记讨论，部署在附近农村发展党员，将附近农村划片，派党员成立工作组在各片开展工作。将小江东岸的垌心等村划为一片，由伍雍谊、王琼儒等负责；小江东南的北河坡、塘埇角、麓表湖为一片，由陈冠庸、卢文、邓业懋三人负责；小江南面的大路底、车麓肚等村划为一片，由罗南煜等人负责。要求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从中挑选觉悟高、政治可靠的人作为入党教育对象进行党的知识教育，把抗日认识、一般的阶级认识提高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水平，明确党的性质、纲领、政策、纪律、党员标准，严守党的秘密，不能简单从事，不能降低党员标准。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各片先后吸收了黄春林、宁瑞文、陈家桂、陈毓斌、宁业富、宁章毅、宁章秀、宁业华等 10 多人入党，分别成立党支部和党小组。

1939 年 10 月，经中共合浦县工委批准，成立小江区委，管廉中、一中、小江、龙门、福旺的党组织。区委书记李秋，委员谢伯寿、黄春林，区委管辖的农村党员分布如下。

小江附近农村。垌心村有陈家桂、陈毓斌，1940年春吸收陈保兴、陈均仁、陈国璋等。北河坡村有宁业富、宁章毅、宁章秀、宁业华。大路底、车麓肚有黄春林、宁瑞文等。

龙门附近村庄有岑嘉毅、谭家驹（塘田冲）、陈兰桂（丁村）、周五（新车塘）、吕从英（牛哥岭）、陈德兴（石头塘）、赖泽堂（大幸）、容美廷（六衣）、丁青莹（草屋）、黄福远。龙门圩上有赖德建、余秋甫、陈福才等。李山在县委机关被破坏后不久，消极脱党，影响到一些党员也消极起来。

街口坡有宋家培、宋家政、宋德驰、宋其英、宋传克等。

福旺镇脚有谢伯寿等。

寨圩的农村工作。寨圩的党员当时都集中在寨圩简师中，1939年8月，寨圩学生党员蒙英翰利用暑假回到家乡修竹村，教育吸收农民蒙英秀、蒙英德入党（经寨圩党组织批准）。年底，蒙英翰、谢善炳又在石陂村教育吸收谢善瑞、谢善英、谢善谋3人入党。修竹、石陂都属灵山县境，但这两个村的党员都属寨师支部管。

西场地区的农村工作。合浦南部多属平原地区，人口较稠密，地主官僚多，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革命性，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因而，当地党组织很重视和积极做好农民工作。

西场在合浦西南部，南面临海，基本上是平原地区。早在抗日战争前，黄铸夫就在当地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成立“中青读书会”，在北海重建党组织时，即在西场发展一批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场建立起400多人的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掌握在西场党组织手中。西场党组织和青抗会很重视农村工作，党组织和青抗派黄模到那龙小学任校长，成立青抗分会，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到1939年上半年，该地有党员7人，建立起党小组。派党员黄质兴往西坡任小学校长，成立青抗分会，同期党员达到12人，成立党支部。派吴际棠到白沙头建立青抗分会，党员发展到4人，成立党支部。派庞殿勋、王贵德到大坑口村建立分会，党员发展到7人，成立党小组。派王禄安、黄裕起往芋地坑建立分会，党员增加到6人，成立党小组。此外在野狸水、邕江各有党员2人。这些党员在农村以夜校、办墙报、举行军事训练、口头宣传、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教育和组织农民，提高当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作战能力。1939年8月成立中共西场区委后，农村工作进一步加强。

公馆、白沙地区的农村工作。公馆区面对铁山港，背靠山区，多丘陵，辖区有公馆、闸利、白沙、山口、曲樟等乡镇，地主官僚多，围闸房屋多，而广大农民则很贫苦。早在1937年春，党员张进煊就在公馆五中工作，1939年入党人数达30多人，到1941年增至70多人。1939年4月建立区委，区委书记邹贞业，组织委员张书坚，宣传委员张九匡（后是陈铭金）。区委很重视开展农村工作和在农村中建党。1939年至1940年初，在农村中建立的主要据点和组织有：龙颈村于1939年8月成立党支部，支书廖尚智，组委廖世津，

党员有朱香廷、廖五十哥、廖尚坤等。廖尚智调往白石水参加武装斗争后，由廖世津任支书，廖尚坤任组委，朱香廷任宣委。浪坡村在10月建立支部，支书徐永源，党员有徐汝竑、徐永清等。东城乡于1940年1月成立支部，支书吴炳宽，党员有陈铭璧、叶吉英、吴炳秀、叶逢绍、吴二十五哥等。梅菪垌宏德小学在3月成立支部，支书陈廷，党员有陈铭龙、钟高球、钟建辉、刘守仁、刘炳如等。茅坡在同一时期成立党支部，支书张书坚，党员有张义生、张声程、张辉等。白沙（包括附近农村）党支部，支书周立光，组织委员李成，宣传委员周洪英，党员有张九秀、赖子昆、赖子能、蒋四哥等。这些党组织建立的农村据点：白沙有龙颈村、陂头下、木岩塘、崩岭、梅菪垌、白沙圩、茅坡村等。公馆有浪坡徐屋场、香山、石头湖、盐田、山口村、樟木山、枫树林。山口乡有山角村、对达村。在这些村中办起夜校作为宣传教育阵地，建立起农民会、盐民会、担盐会、同心会、兄弟会、姐妹会等群众组织，把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从1939年起便在下列村庄建立秘密交通站：浪坡徐屋场，负责人徐永清；宏德小学，负责人陈廷、刘守仁；六湖垌山口村，负责人陈九思；龙颈站，负责人廖世津、廖尚坤。这些站负责收集递送情报、送信联系、接送过往革命人员、护送文件物资、购买组织需要的用品等。

1940年4月，公馆区委换届，由徐永源任书记，组织委员吴炳宽，宣传委员陈廷。1941年改组，由阮明任书记，组织委员陈廷，宣传委员徐汝竑。

南康地区的农村工作。南康在合浦县南部，除南康镇外还有福成、白龙、婆围、石头埠、大龙和闸利等圩镇，东南和南面临海，大部分为沿海平原，组织上属廉北区委管。1938年以后，南康有一些在廉中、一中读书的学生入了党，假期回南康进行宣传活动。1940年3月，合浦三中（在南康）建立党支部，支书张家葆，党员许维芳、廖世华。9月，党员陈冠庸、陈莲珍、邓爱莲、陈廷瑞、李文豪在石头埠小学教书，建立支部，支书陈冠庸，在附近的粟山村等地发展了一些党员。到1941年南康地区有党员44人，多集中在圩镇上。1940年3月，郭兆荣、黄翠琼在福成小学教书，在福成圩及附近的上窑村办夜校，开展宣传工作。1941年3月，党组织调岑焕祥、钟逢显、陈精志、黄愈辉到白龙乡石牛岭小学教书，成立党小组，钟逢显任组长（后是岑焕祥）；调朱家英到闸利平坡小学任教。9月，调姚为政到彬畔小学教书，以后逐渐控制了石头埠、彬畔、盐灶、塘仔、婆围、彬塘、平坡等一批小学作为阵地开展农村工作。有党员20多人，分布在南康的粟山、石头埠、扫管龙、黄丽窝、下塘、长塘、彬塘，福成的上窑、高平岭，婆围的盐灶，闸利的平坡等村，党组织逐渐在农村扎根。

北海的农村工作。1938年日军在涠洲岛登陆后，北海党组织即决定在附近农村开展工作，准备以农村为抗日根据地打游击。1939年1月，北海特支书记郭芳到附近的龙潭村平民小学任校长，6月，调王惠澜到小学任职，在当地办夜校教育农民。1939年5月，吸收当地村民陈德藩、林英香、林保章等3人入党，成立党小组，郭芳任组长。6月，继续在

龙潭及附近村庄吸收林寿甫、韩瑶晃、张木养、林受权、张冠均、陈心树6人入党，成立党支部，王惠澜任支书，分成3个党小组，党员分布于5个村庄。成立抗日联防队，有五六十人，10多支枪，推林晃章（民主人士）当队长，林英香当副队长，到海边放哨，监视敌情。

第三节 抗击反共逆流的斗争

县委东馆扩大会议对抗击反共逆流斗争的部署

1940年2月，中共南路特委成立后，派组织部部长温焯华到白石水区东馆小学召开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时局宣言》，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会议分析了全国和合浦的形势，认为合浦国民党当局紧跟国民党中央顽固派的反共步伐，掀起反共、压制群众抗日的政治逆流，要掀起反逆流的斗争，打退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力争时局好转。在青年学生中，要发动学生反对反动分子和反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农村中，要发动农民开展反奸商勾结反动官僚运米和战略物资资敌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各种斗争运动中广泛宣传中央提出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政治方针，使之深入人心，打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会议对各地区的斗争作了布置。会议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将中共合浦县工委改为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任命黄其江为中心县委书记，谢王岗和朱明仍分别任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原县工委书记张进煊调往高州工作。会后，县委领导机关迁到白沙乡宏德小学。

根据这次会议的部署，会后各区便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汪反逆流斗争。

作为反对反共逆流的思想舆论动员，县委决定和部署在1940年4月的一个晚上，统一在全县范围内散发“八路军通电”（即《告全国人民书》《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材料）。这些材料由县委布置何国达在小江他姐夫陈锡汉（民主人士）开的印刷厂，选用上好的白报纸和清晰的铅字印刷，细心校对，尽可能做到没有错别字，共印了数千份，印得十分精美。印好后，由秘密交通运送到各区，事先做好准备，按县委通知，在同一个晚上于廉州、北海、西场、石康、南康、公馆、白沙、张黄、多蕉、常乐、旧州、白石水、龙门、小江、福旺、寨圩等地向机关、学校、重要商店散发，在街头、交通要道张贴，又通过邮政或其他方法分寄给知名人士或反动分子。这样，一个晚上四处都出现共产党的传单，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区乡长及各单位的负责人都十分震惊。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封锁和开展反共宣传，人们不能真正了解抗战的形势和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这些传单的散发，给社会人士一次很重要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明白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对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及共产党有了基本的认识，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威信，群众倾向共产党。有很多青年学生看到传单后，都认真阅读或组织讨论，这是反对反共逆流的一次宣传和动员。

这种广泛的统一行动，给国民党当局巨大的震撼，他们知道共产党已经发展到全县广大农村，成了潜在的巨大力量，对其统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要下决心采取应对措施。但是，散发传单的地方很多，只在北海捉到贴传单的陈秉洁、李梓明，其他地方散布者都无踪影，连特务都找不到具体的人和实据。这次发传单影响很大，但也是党的力量的一次大暴露。

学校阵地的斗争

合浦一中反杨超兰的斗争。1938年11月，日军飞机炸毁了合浦一中在北海的校舍，部分师生迁往小江建分校，成立抗日先锋队，抗日运动和学生进步书刊的风气十分高涨。1939年2月，合浦一中当局为了防止学生“左”倾思想的发展，便在合浦县城西面、南流江东岸的大石屯再建分校，高中部设在那里，长塘山不设高中部，指派思想反动的杨超兰为训育主任，主管学校。合浦中心县委决定，调小江分校的教师陈任生到大石屯任教，学生党员卢文、进步分子伍朝汉、仇乃梁等到大石屯读书。当时，大石屯分校的学生中有5个党员：卢文、王惠兰、王朝明、罗伉烈、劳克，原拟由黄坚当小组长，但她因病回了东兴，没有到校，改由卢文任组长，受陈任生领导。不久，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升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仍兼任一中校长），学校便由杨超兰负责全面工作。杨超兰思想反动，忠实地秉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旨意，在各种场合大肆散布反共言论，对合浦一中学生的革命行动和抗日爱国活动多方阻挠和打击。学生们在学校周围的畔塘、窖口、九坡等村开展抗日宣传、办农民识字班活动，都受到杨超兰的种种限制，动不动就以旷课论处。训斥到社会进行抗日宣传的学生是“野马”“不务正业”“上了共产党的当”。杨超兰不准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把阅读进步书刊的学生判作“思想赤化、不堪造就”，把具有高度觉醒的抗日爱国学生诬蔑为“蒙面之马”，即被人蒙蔽，受人指使，就像磨盘边被蒙上眼睛的马被人赶着转一样。杨超兰还专门收买、培育一些思想反动、品质不良的人充当其走狗，专门在学生中搞跟踪、密报等特务勾当，对一批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学生进行监视、打击。6月，合浦中心县委被破坏，陈任生被捕。7月，学期结束时，杨超兰就以“思想赤化、不堪造就”的罪名，勒令接近陈任生的学生卢文、伍朝汉、仇乃梁、何坤、廖元睿等10人退学（后经斗争，争取到迁往小江的廉州中学借读）。其后，中心县委决定调罗永莹、邓爱莲等到大石屯分校读书。9月，发展谭俊（谭锡裕）入党，成立党支部，罗永莹任支部书记。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合浦当局加强对合浦一中进步学生的控制。杨超兰经常在学生中散布对抗日悲观失望的论调，谩骂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奸党”“危害国家”，造谣中伤，破坏团结；宣传一党专政，实行特务统治，压制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杨超兰由于在合浦一中实行法西斯统治，已成为学校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严重障碍，其言论和行动实际上对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起到了破坏作用，与汉奸汪精卫唱同一调子，是名副其实的“汪派汉奸”。合浦中心县委书记密切注视着杨超兰掀起的反共逆流，关心合浦一中全体师生的前途和命运。1940年4月，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组织部部长谢王岗召集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罗永莹、谭俊、邓爱莲开会，研究和布置开展反杨超兰的斗争。与会者一致认为，根据杨超兰长期以来的言行表现，他实际上已起着同汪派分子一样的作用。为了扫除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障碍，必须开展反杨超兰的斗争，揭露他的反动面目，以推动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开展。会议指出：①开展反杨超兰斗争是反汪反逆流斗争的一部分；②在群众中揭露杨超兰投降顽固派的面目；③赶走杨超兰。

5月上旬，杨超兰在高三班上课时，公然指责迁校小江镇的廉州中学学生支持当地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是“越轨行为，受人利用”，并警告合浦一中学生不得仿效。这时，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学生会副主席谭俊实在忍无可忍，就站起来阐明廉中学生支援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是爱国的正义行为，不是越轨或受人利用，并指出杨超兰是在挑拨一中学生与廉中学生的关系，破坏团结。谭俊的发言得到了同班同学的积极响应，学生吕剑平等纷纷站起来揭露杨超兰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监视、打击爱国进步学生，大搞特务活动的罪恶行为。杨超兰恼羞成怒，课还未上完就急忙溜走了，并打电话到县政府求救，诬告学生造反，要求调军警前来镇压学生，从而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高三班学生批驳、揭露杨超兰罪行的斗争震动了全校，在合浦一中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其余各班级的学生也纷纷起来揭发、声讨杨超兰的罪行，反杨超兰的斗争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展开。

为了镇压学生们反杨超兰的斗争，学校当局立即宣布开除谭俊和罗永莹的学籍。但反杨超兰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被镇压下去，学生们推选20多名代表前去向周胜皋请愿，要求撤销对罗永莹、谭俊的处分，撤换杨超兰，周胜皋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正义要求。于是，合浦一中党支部继续组织领导学生坚持斗争，并大量印刷“打倒制造纠纷、挑拨离间、迫害进步学生的汪派汉奸杨超兰”的传单，向社会广泛散发（除了向合浦县城、北海等地散发，还组织学生到小江、寨圩、公馆、南康等地散发）。全县各中学也纷纷召开大会，声援合浦一中学生反汪反逆流斗争的行动。这时，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行政专员邓世增和合浦县县长李本清对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惊恐万分，邓世增亲自带领大批军警包围合浦一中，迫令全校学生集中在广场，对学生们进行训话。邓世增在训话中先是威胁，后是“劝导”，告诫学生们要“安分守己”（意思是不要搞抗日救国活动），“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接着，又假装十分痛心的样子，说邓家出了一个邓爱莲（邓世增的侄女，是这次反杨超兰斗争的领导者之一）是个大不幸，并要邓爱莲站出来当众认错。但邓爱莲早已识破邓世增这一套阴谋手法，拒绝参加这次“训话”会，使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不能得逞。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尽快将反杨超兰斗争镇压下去，于6月初便举行学年考试，提前一个月放暑假。但在整个暑假期间，仍有许多学生留校坚持斗争。后来，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强对合浦一中的统治，便于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迫令合浦一中迁往紧靠合浦县城的平田村，但在那里，抗日爱国学生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反杨超兰的斗争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定目的，杨超兰仍赖在合浦一中，但揭露了杨超兰的反动面目，收到了扩大政治影响和鼓舞群众斗志的良好效果，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斗争。

合浦五中反林宝鸿的斗争。1940年春，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为了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任命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林宝鸿、赖功奏、廖斌秀分别为合浦五中校长、教导主任、附小主任，他们对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和进步表现恨之入骨，经常公开指责学生，诽谤要求抗日追求进步的学生是“害群之马”“危险分子”，并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3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思想反动的体育教师在上课中无理训斥学生，学生陈元义、陈澍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反驳了几句，林宝鸿、赖功奏竟不问情由便给陈元义、陈澍益各记大过一次，想以“杀鸡儆猴”的办法震慑学生，扼杀学生的进步活动。这种做法把学生激怒了，学生们选派代表找林宝鸿、赖功奏讲理，林宝鸿、赖功奏理屈词穷，但置之不理。因此，学生们更加愤怒，准备进一步开展反林宝鸿斗争。恰好此时，合浦五中党支部接受了合浦中心县委布置秘密散发八路军通电《告全国人民书》的任务，并组织学生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传单发遍公馆圩镇及附近农村。国民党公馆区区长林作周和林宝鸿、赖功奏等大为恐慌，认定这是共产党有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并怀疑这次活动与合浦五中的学生有关。于是，学校当局与区长林作周以及顽固派分子张枚新等勾结起来，派出军警突击搜查进步学生的宿舍和设在圩上的“统一书社”等处，引起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学生党员在公馆区委的领导下，带领学生代表责问学校当局为何非法搜查学生宿舍，并痛斥他们的无耻行为，揭露他们破坏抗战，迫害学生，倒行逆施的丑恶嘴脸。林作周、林宝鸿等恼羞成怒，派大批军警到合浦五中戒严，并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开除了陈铭金等8名学生的学籍（其中6名学生是中共党员）。合浦五中党支部立即发动学生一致起来抗争，限令学校当局在3天之内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并承认错误，否则便举行全校罢课。但学校当局坚持错误，到期仍无答复，于是全校学生开始罢课。罢课开始后，学校当局又开除陈科龙等6名学生的学籍，对赖祖辉等两名学生记大过处分。这样斗争就更加尖锐了，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罢课学生成立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罢课斗争。罢课学生几次印发告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学生家长书，并分别走访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有声望的学生家长，阐明事实真相，揭露林宝鸿、赖功奏等镇压抗日救国运动、诬陷学生、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提出撤销林宝鸿和赖功奏的职务、恢复所有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今后不得诬陷学生等要求。罢课持续了10多天后，在群众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学校当局向校董会作出让步，被迫召开校董会，答应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但要他们写悔过书，学生自然不答应。最

后还是开除了陈铭金等 11 名学生（其中 7 名是党员）。这次反林宝鸿斗争充分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嘴脸，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团结教育了全体学生，使他们更坚定走革命道路。

寨圩简师反梁宝雅的斗争。1940 年 5 月，中共寨圩特支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但这场斗争被国民党寨圩当局镇压下去了，简师（寨圩简易师范）校长陈业昌、教导主任卢壁光先后被迫离开学校。1940 年秋，国民党寨圩当局为了进一步限制进步师生的活动，委任思想反动的梁宝雅为简师校长。梁宝雅到简师后，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擅自制定了限制师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规定，明令学生不得开展反汪斗争，不准结队外出，不准阅读进步书报，连当时公开发行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也明令禁止阅读。梁宝雅还与学生中的三青团骨干、特务分子等勾结在一起，加强对进步学生的监视和控制，并在学校经费管理委员会（简称经委会）上提出，在校生都要经过再考试，不合格的要勒令退学，企图以成绩差为借口开除一批进步学生，还以加大学生的功课负担来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但由于经委会大多数成员都不同意梁宝雅的意见，使其企图没有得逞。11 月，梁宝雅又勾结寨圩区区长罗光烈，两次派军警到简师要逮捕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自治会主席蒙英翰，但由于学生们坚持与梁宝雅、罗光烈作斗争，并组织学生到街道、农村揭露罗光烈贪污腐败以及带兵包围学校、逮捕学生等罪行，使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到处都说这个贪污区长，不但贪污了商家和老百姓的钱，连学生也不放过。在群众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梁宝雅、罗光烈看到形势不妙，便收兵撤出简师。梁宝雅的丑恶面目令师生倍加憎恶，简师党支部决定开展驱逐梁宝雅的罢课斗争。罢课开始后，许多学生纷纷下到农村，动员民众起来抗日，并揭露梁宝雅执行反共、倒退路线，在学校公开镇压学生抗日活动，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简师的优良传统等罪行，坚决要把梁宝雅赶出简师。罢课斗争坚持三个月，至 1941 年 3 月，县长李本清亲自到简师处理学潮事件，根据梁宝雅暗中列出的在简师“闹事”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名单，宣布开除 15 名学生的学籍，同时下令通缉已离校的学生蒙英翰、蒙英经等。于是，这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先后转入地下，开展新的反逆流斗争。这次反梁宝雅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同合浦五中反林宝鸿的斗争一样，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逆流热情。

此外，廉州中学、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也都先后开展了反逆流斗争。已迁校到小江的廉州中学师生深入山区农村，通过办夜校、演戏等方式向小江农民群众宣传抗日，发动和领导了小江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合浦三中党支部利用各种纪念日，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和五四青年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纪念日，组织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游艺会、讨论会，在学校里或到街道、农村出墙报、画漫画、写标语、演戏、唱歌等，特别是 1940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南康各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处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以及汪

派汉奸卖国投敌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号召群众抗日救国，使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激发群众对日军、汉奸卖国贼的仇恨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义愤。

由合浦中心县委发动各校学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学校代理人的斗争，锻炼了党的组织和党员，教育了大批参加斗争的学生，揭露和孤立了顽固分子，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为后来领导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合浦米案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随着时间的持续，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消耗的增加，兵力的分散，物资和后勤供应日益困难。于是，除了大肆掠夺占领区的资财外，还千方百计从国民党统治区取得给养。国统区潜藏的汉奸、奸商和贪官污吏，为了获利，便相互勾结，高价抢购大米、桐油、铜圆等战略物资偷运出口，供应日军。涠洲岛、海南岛分别于1938年9月、1939年2月相继被日军侵占后，合浦、北海的奸商通过海上运输将物资运到涠洲岛或海南岛资助敌人。到1939年11月，日军从钦县登陆，占领了钦廉四属地区的钦县、防城和桂南地区的南宁、邕宁之后，接着入侵灵山、横县，奸商运输物资到日军占领区资敌的活动更加猖獗，一些地方官僚为了私利，不顾国家存亡和人民的死活，勾结奸商、汉奸抢购大米资敌，大发国难财。特别是在1940年初青黄不接的季节，这些民族败类在各乡镇大肆高价抢购大米资敌，引起合浦地区米价暴涨，每筒米（旧秤约10两）由1角7分涨至7角左右，许多群众因此断炊挨饿，甚至出现饿死的现象。广大民众对哄抬米价的官僚、奸商恨之入骨，纷纷要求严惩运米资敌的奸商，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益。中共南路特委和合浦县工委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领导合浦人民普遍开展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史称“合浦米案”）。斗争的口号是：“反对汪派汉奸卖国贼运米资敌！”“反对贪官污吏勾结奸商运米资敌的卖国行为！”斗争的方式是：①召开大规模的反对运米资敌斗争大会及组织群众请愿，揭发、抗议民族败类运米资敌的卖国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制止运米资敌行为，惩办资敌卖国的民族败类；②组织群众到各圩场阻止民族败类抢购大米，把已高价抢购的大米拿到圩场上平价出售；③组织群众将中途拦截奸商外运的大米，拿到圩场上平价出售。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斗争的普遍开展，使合浦的抗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

南康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39年5月，南康的一个圩日，市场米价一天数变，大米霎时被抢购一空。经调查才知是合浦县自卫大队队长陈均仁勾结奸商李仲谦高价抢购，罪行群众揭发后，国民党一七五师驻军从白沙头拦回李仲谦即将启运的两船大米。南康青抗队等救亡团体和一七五师政治部青年指导员叶乃沃当即发动数千群众向镇公所请愿，要求惩办奸商，没收大米。几天后，专员邓世增到南康调解。邓世增在群众大会上为奸商辩护，

受到群众驳斥，逼得慌忙躲进合浦三中，愤怒的群众又拥至合浦三中示威请愿。邓世增为了脱身，采取欺骗手段，假意答允惩办奸商和没收大米。随后，邓世增将李仲谦“押”回廉州释放，并将大米还给奸商。这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反运米资敌的斗争，也是合浦米案事件的前奏。

多蕉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39年秋，中共合浦县工委派罗英（罗永璞）到多蕉乡中心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不久，中共党员罗英、何世钦、邓筱筠（邓家珍）建立了多蕉乡第一个党支部，罗英任支书，后来发展黄祚利（黄平）等人入党。中共多蕉乡党支部在师生和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广泛团结教育群众，还派党员和进步教师及党所培养的对象参加乡公所武装集结队，并成为该队的骨干。1939年冬，钦县、南宁相继被日军占领，多蕉是合浦县东北通往钦县的要冲，常有奸商将大米、桐油、铜圆等物资经过多蕉偷运往钦县资敌。于是，多蕉乡党支部通过武装集结队查缉通敌的卖国奸商。

一天晚上，根据撑渡老汉的通报，有人偷运物资准备去钦州，武装集结队在党员的带领下早就守候在多蕉渡口的对岸。当晚10时许，果然有几个人领着10多担货乘竹排过河，等他们上岸后，武装集结队马上截停，进行搜查，结果查出是桐油、铜圆、鸦片等物资。那几个带领挑夫的家伙立即凶相毕露，拔出手枪来威吓。武装集结队毫不畏惧，即向他们发出警告，他们不敢嚣张，武装集结队便将这批货扣留起来。国民党多蕉乡公所得知情况后，由副乡长出面为奸商辩护，说这批货物有特殊通行证，应该放行，并责备武装集结队干预政府的事，声言要解散武装集结队。武装集结队不为所动并向乡公所请愿，要求乡公所依法制裁卖国奸商，结果又遭到乡长的拒绝，乡公所强行将这批货物放行，将奸商放走。请愿群众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表示对反动乡长的抗议。斗争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更加看清国民党贪官污吏勾结奸商、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面目。

沙岗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39年2月，西场党组织派党员王克等到沙岗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6月，建立沙岗乡第一个党支部，王克任支书。中共沙岗乡党支部通过办夜校和组织剧团、宣传队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派党员王益参加国民党沙岗自卫大队任中队长。1939年冬，日军从钦县、防城登陆后，奸商偷运大米、桐油、铜圆资敌的活动非常猖狂。沙岗自卫大队大队长王国光竟然勾结奸商杨秀甫在沙岗抢购大米，外运资敌。一天，沙岗抗敌后援会缉获杨秀甫恰好外运资敌的一批大米、桐油。沙岗乡党支部立即发动学生及其他群众数百人举行反汪、反运米资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运米资敌”“打倒王国光、杨秀甫大汉奸”等口号。接着，派20多名青年到廉州，同西场青抗会代表、廉州战地服务团和北海学生队等100多人，联合向国民党合浦县政府请愿，提出“惩办汉奸王国光、杨秀甫”“禁止运米资敌”等要求。县政府秘书王佐彝用“等候研究处理”等含糊词语搪塞，欺骗群众。

请愿代表回到沙岗后，王国光恼羞成怒，在国民党合浦自卫团第三支队队长陈南的授意下，逮捕了请愿的吴华英、莫宝库、曾纪緯、曾纪欽、莫鼎欽、符佳、顾际聰、顾际顺、苏树峰等 10 多名代表，翌日将他们押送廉州。沙岗乡党支部为提防王国光在途中暗杀这些青年，通过王益安排几个班长暗中保护。这些代表被押至廉州时，个个挺胸昂首高歌：“打倒日本，除汉奸！”沿途出来观看的群众十分惊奇，议论纷纷：“抗日救亡，也有罪吗？”“难道反对奸商、汉奸运米资敌也错吗？”到合浦县政府后，县政府迫于舆论不敢受理，把被捕的教师、学生退回沙岗关禁处理。后来，沙岗乡党支部发动当地上层人士出面交涉，王国光不得不释放被扣押的代表。

廉州大请愿。1940 年 2 月，中共合浦县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在合浦全县开展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并根据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迫切要求，把这一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合浦米案事件为突破口，在现有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反汪、反逆流的斗争。会后，合浦县工委决定，由中共廉北区委和中共西场区委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罪恶行径的请愿运动，指定由廉北区委书记庞达负责全面领导。庞达指派王克、郭芳、张家保、罗永莹、庞自等 7 人组成临时党团，秘密负责请愿现场的领导工作，王克为党团书记。同时，为了有利于对付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和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选定由邓爱莲（邓世增的侄女）、李梓明（北海学生队队长）公开出面带领群众开展斗争。

庞达在临时党团成立时传达了中共合浦县工委的指示：这次请愿运动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揭露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与汪派、汉奸、奸商勾结，政治上破坏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监视进步学生，查封抗日救亡团体，准备投降；经济上偷运大米、桐油、铜圆等战略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丧心病狂甘当汉奸的罪行。要求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必须制止这种卖国殃民的罪恶行为。在请愿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做到因势利导，把这场请愿运动推向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斗争的高潮，以便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三个“坚持”的信心，并当众用事实和行动警告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倒行逆施是不得民心的。

经过短短几天的紧急发动，沙岗、西场、石康、南康、廉州、北海等地党组织共动员群众 2000 多人，于 2 月 11 日上午 9 时左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廉州东山寺（国民党合浦县政府所在地），把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禁止运米资敌”“反对囤积居奇”“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益”“反对贪污舞弊！反对抓丁拉夫”“反对借名抗战，大发国难财”等口号此起彼落，吓得县政府的官吏惊惶失措，急急忙忙把大门关闭。群众要求县长李本清出来答话，但他因害怕龟缩衙内，不敢露面。邓爱莲和李梓明便在县政府门前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用沙岗、西场、南康、多蕉等地最近发生的奸商运米资敌的事实，控诉奸商运米资敌的卖

国罪行，揭露国民党官吏贪污舞弊等罪恶行径。庞自拟了《反对运米资敌，反对逆流的请愿书》及写了一篇短而有力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进行宣传鼓动。至下午4时，县政府还不派人接见，群众纷纷要求第二天再来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晚上，临时党团召开会议，会上，王克向庞达汇报了请愿情况，庞达指出：据反映当天请愿对廉州城内外震动很大，民众基本上都赞成这次反对运米资敌的行动。会议对第二天的请愿运动作了具体安排。

第二天，请愿人数更多，约3000人，将县政府团团围住，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又高呼“我们请愿书上提的禁止运米资敌，请县长答复”“我们要求惩办运米资敌的奸商，请县长答复”等口号。李本清眼看赖不了账，便派县政府秘书王佐彝出来接见群众。但王佐彝在讲话中避而不谈请愿代表提出的要求。群众十分恼怒，爆发一阵阵“滚回去！滚回去”“要李本清亲自出来”的喊声，王佐彝便灰溜溜地退回关上大门。这时，请愿的群众非常气愤，有些人主张撞开大门冲进去，但请愿队伍指挥部的同志想到斗争要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说服大家冷静再想想办法。不久，王佐彝又叫人打开大门，提审犯人，审判厅里站着的警察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妄图以此威吓群众。但群众并没有被吓倒，情绪更为激愤，有些人主张立即冲进去跟王佐彝辩论。但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指挥部的同志要求大家不要冒险冲进去，并决定各个队伍就地以地区为单位集中起来，宣传员对群众演讲，进一步揭穿国民党顽固派搞逆流的反动实质。随后，指挥部研究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吩咐大家准备好明天再斗争。

第三天，参与请愿的群众又比第二天几乎增加一倍，口号声一浪比一浪高：“要李本清出来见面！”“要李本清出来回话！”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李本清被迫战战兢兢地爬上了矮墙头，面对着愤怒的群众答话。他答允压低米价，并查办运米资敌的奸商，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场斗争，是合浦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所领导的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力量的一次大检阅。通过斗争，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使群众增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信心。

请愿后不久，国民党南路行署主任罗翼群到合浦。廉北区委获悉后，组织队伍前往罗翼群住处“德国楼”（今还珠宾馆内）请愿。当天凌晨4时，合浦战地服务团40多人，冒着彻骨寒风，涌到“德国楼”前，高呼口号，把罗翼群从梦中惊醒。罗翼群起初不肯出来接见，但群众坚持请愿了几个钟头，弄得他走又走不得，留又不安然，上午8时才被迫出来接见。代表向他提出“压低米价，改善人民生活，严惩运米资敌的奸商”等要求，罗翼群都答允了。然而这却是李本清、罗翼群等欺骗群众的退兵之计，请愿队伍撤退后，李本清、罗翼群等仍然纵容、支持奸商运米资敌，甚至进一步出兵镇压各地反运米资敌的群众。这就在广大群众面前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顽固反动本质，使群众更认清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西场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4月，国民党合浦自卫团第三支队队长陈南，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不理睬西场青抗会的抗议，每逢圩日便派人在西场高价抢购大米，运往合浦海域外资敌，群众买不到米，激起义愤。在中共合浦县工委的领导下，西场的共产党员朱明、罗刚、黄模、劳锦、包恭、王贵德、陈家熙、庞殿勋、石起、罗人迎、张启泰、梁国珍、庞玉全、黄人彩、叶崇业等组织发动群众，由国民党西场区分部（共产党员石起任区分部书记）和西场青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出面，召开西场各界反汪救国大会。

4月8日（圩日），西场牛圩坡挂出“西场各界反汪救国大会”的横幅。上午10时许，高呼口号，群众知道召开反汪大会，纷纷赴会，很快就集合了2000多人。会场上歌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大会由国民党西场区分部书记石起及青抗会负责人陈家熙、王贵德主持，西场镇副镇长莫由均为了监视群众，也出席了大会。陈南还派中队长黄毅带领全副武装的自卫队，恶狠狠地在会场巡逻。王贵德首先在会上讲话，他指出：自日军侵占濠洲，又在龙门、企沙登陆钦防后，魔爪已伸到合浦，汪派汉奸活动更加猖狂，汉奸就好像“为虎作伥”的伥鬼，帮助老虎去害人，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伥鬼”！现在西场有人勾结汉奸收购大米、铜圆资敌，这不是“伥鬼”是什么？台下的群众听到这里，迸发出一阵阵“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呼喊声。接着莫由均上台讲话，他否认有人运米资敌，黄模、张启泰、罗人迎立即同他辩论，指出奸商从西场大风江将几船米外运出海的事实，讲述群众没有米吃的苦楚，他们边讲边流下悲愤的眼泪，令莫由均十分尴尬。台下青年农民洪利勇愤怒质问莫由均：“你们当官的只会捉征兵，不知压低米价，不捉汉奸，群众没米吃，难道叫大家去做贼、当汉奸？”莫由均马上断章取义，诬说洪利勇煽动群众去“做贼当汉奸”，下令自卫队捆绑洪利勇。与会群众义愤填膺，大家振臂高呼：“不准逮捕爱国人民！”“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洪利勇被押回西场镇公所后，群众涌向镇公所请愿，街道被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请愿群众向西场镇公所提出六项要求：①禁止运米资敌；②禁止抬高物价；③严惩陈南，逮捕汉奸洪元盛、王国光；④不准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准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⑤不准逮捕爱国人士，无条件释放洪利勇；⑥要求政府致电七区（以高州为中心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七行政区）无条件释放爱国青年罗文洪、文允武等。与此同时，罗刚、罗人迎、张启泰、吴济堂、卢善辉、陈禄纪、陈家熙、黄幼茜（黄家秀）、梁国珍、庞玉全、廖慧明、钟少华等轮流向圩镇上的群众演讲，控诉陈南、莫由均等破坏反汪运动的罪行。请愿群众情绪激昂，互相鼓励，坚持请愿。到了晚上，点着汽灯，唱歌、演讲、喊口号，通宵达旦。请愿持续了两个昼夜。

在请愿过程中，陈南等进一步采用高压手段，逮捕了正在演讲和贴标语的学生陈国强和文经，在西场广州会馆面前逮捕了正在演讲的庞殿勋，开枪威吓群众。陈南不顾群众的强烈抗议，将被捕的洪利勇、陈国强、文经和庞殿勋押送廉州，群众面对陈南一伙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中共西场区委又组织队伍赴廉州请愿，各党支部及党小组在圩镇和农村

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请愿队伍，募捐大米、薯干等，组成以党员及青抗会会员为骨干的包括教师、学生、农民、小贩等约 500 人的队伍，步行赴廉州请愿。请愿队伍由朱明带队，一路唱歌、喊口号，浩浩荡荡，斗志十分旺盛。请愿队伍到总江渡口时，天已黄昏，迁校至大石屯的合浦一中部分师生闻讯赶来迎接，表示坚决支持西场人民的正义斗争，激励了大家的斗志。请愿队伍进入廉州后，国民党合浦县当局设下假意接待的圈套，把请愿群众分散在钟鼓楼、孔庙、朱赢小学等 3 个地方“住宿”，当夜全城戒严，不准请愿群众出入。第二天下午，反动军警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威迫请愿群众，逐个搜身后，驱赶出城。当场逮捕了罗刚、陈家熙、罗人迎、吴济堂、詹日才、裴凤芝等。不少请愿群众同驱赶他们的反动军警争辩，申明请愿的缘由，控诉陈南运米资敌的罪行。当天晚上，请愿队伍回到白沙江时，有一个化名为无忧的人来报信，说陈南派黄毅带一个中队守在路上，准备开枪射击请愿群众。请愿群众只好在一间祠堂里住宿，第二天上午才返回西场。随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疯狂地镇压西场爱国人士，解散西场青抗会，撤销黄模、庞玉全、石起等的校长职务，还先后逮捕了与米案斗争有牵连的张启泰、卢善辉、黄模等。

中共西场区委为了建立秘密联络点，派庞玉全建立合新绣花店。在店里工作的有庞玉全、廖慧明、陆华英、钟少华、黄苹等几位妇女。她们发动 30 多名妇女投入股金，购回一批布匹、丝线等原料，以刺绣枕面、床眉等工艺品作掩护，从事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她们对被捕入狱的人员怀着深厚的阶级友情，曾几次用挣来的手工钱购买食品，慰问狱中人员。不久，合新绣花店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一个晚上，陈南带兵查封合新绣花店，逮捕了庞玉全、廖慧明。至此，西场反汪斗争中共被捕了 15 人，其中共产党员 11 人（罗刚、庞殿勋、陈家熙、罗人迎、詹日才、裴凤芝、吴济棠、张启泰、庞玉全、廖慧明、陈国强），他们全被关禁在廉州监狱。罗刚重视做狱中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设法弄来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传阅，还做狱卒的思想工作。半年后，国民党将 15 人一起宣判，分别判处 1 年 6 个月、2 年 6 个月、3 年的徒刑，罗刚严词驳斥审判官，当场撕毁了判决书。入狱者一直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

西场反运米资敌的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西场人民的爱国热情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促使人民进一步觉醒，深刻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面目。西场人民在西场地下党的领导下转入了新的斗争。

小江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 年 3 月，中共小江区委根据中共合浦县工委的部署，计划在小江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并根据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迫切要求，决定开展以反运米资敌为中心的反汪、反逆流的斗争。首先在群众中做宣传发动工作。廉州中学（于 1939 年 2 月迁校到小江）的党员及农村的党员分别在小江附近的塘蛹角、北河坡、垌心、那白岭、头山、西塘等村庄，通过举办民众夜校向农民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

揭露官僚、地主勾结奸商运米资敌的卖国罪行。每逢小江圩日，廉州中学学生到街头进行宣传，讲抗战形势，激起群众对奸商、汉奸的仇恨。经过一番宣传发动后，中共小江区委决定于5月1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小江圩日）在小江圩粮食市场召开群众大会。为了不使党员暴露，拟定推选塘涌角村较有名望的非中共人士陈达才和该村小学校长陈仕舟（陈时洲）主持大会，并决定会后组织群众到乡公所请愿和到南流江边拦截准备外运资敌的粮食。

5月1日上午9时左右，各地群众以赶集的形式陆续去到小江圩粮食市场，共有2000多人参加大会。由陈仕舟宣布召开反对运米资敌群众大会，陈达才主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陈达才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奸商抢购大米外运资敌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奸商运米资敌。与此同时，会场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倒汪派汉奸”“反对合浦县国民党官僚和奸商勾结运米资敌”“反对支援日寇的卖国投降行为”等口号声此起彼伏，群众情绪非常高涨。随后由陈仕舟提议，到乡公所请愿，要求禁止抬价抢购粮食外运资敌。大会推选宋家培、宁章毅、黄善璠、陈剑威、陈毓彬、谢伯寿、黄春林、黄子兴等为代表，带领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往小江乡公所请愿。请愿群众举着五色纸旗，赶着一头大水牛，在牛身上两边用石灰水分别写上“打倒宋赞乾”“打倒日本鬼”两条标语。群众队伍到乡公所后在门前站着，宋家培等8位请愿代表进入乡公所，要求乡长宋赞乾（宋寿伯）出来答话，但宋赞乾不在乡公所，副乡长王廷英出来见请愿代表，十分惶恐。请愿代表揭露了小江乡乡长宋赞乾运米资敌、贪污勒索的罪行，并向王廷英提出要求：①不准奸商抢购大米，禁止奸商运米资敌；②减轻征粮、征税数目；③撤销目前征收的拆城费（拆廉州城每人摊派费用3.6元）和公民证费（每人0.2元）等苛捐杂税。王廷英在群众强大压力下，被迫答应了上述要求。请愿代表从乡公所出来，向群众宣布副乡长答应群众的要求后，群众队伍便到小江镇旁边的南流江拦截用竹筏载运的大米，不准外运，并封存奸商囤积的粮食。奸商慑于群众威力，不敢继续抢购粮食并停止运粮出口，于是粮价立即下降，每筒米从4角左右降至1角左右。

小江群众反运米资敌的斗争，使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小江乡乡长宋赞乾电告国民党合浦县当局，诬蔑小江的群众聚众暴乱，包围乡公所，强迫副乡长答应群众的要求，为首组织群众的是廉州中学的学生。为此，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决定派合浦县自卫大队长王猷远率一个自卫中队到小江乡镇压爱国群众。5月14日早上，自卫队突然包围了塘涌角村，但没有捉到共产党员，也没有搜查出什么重要的材料，只逮捕了在群众大会上被推选担任大会主席的陈达才和陈仕舟两人，带回小江圩关押在乡公所。这时，小江区委书记李秋和廉州中学的党员罗南煜、陈冠庸、卢文等正在麓表湖村，闻知国民党军队包围塘涌角村后，便离开麓表湖村撤退到该村东面的大山上。当天，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正好也到达小江，李秋向黄其江汇报了小江各方面的情况后，两人商议应付当前局面的

办法。黄其江指出：当前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压境，群众没有武装，也没有武装斗争的准备，没有力量实行武装抵抗，唯有迅速通知各村撤退已暴露人员，避免被逮捕；已被逮捕的两人都是非党的中间和进步人士，可发动地方绅士担保他们出来。随后，黄其江接到国民党要出兵镇压白石水的情报，便匆匆赶去白石水了。于是，李秋立即召集宋家培、伍雍谊和廉州中学的几个党员在南流江东面的大山中开会，就当前的事态研究对策。会议决定：①密切注视自卫队的行动；②通过一个在小江乡公所做乡警的地下党员了解陈仕舟、陈达才被捕后的情况，研究保释的办法；③通过党员向群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罪行；④党员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以免遭受损失；⑤派与王猷远有宗族或亲戚关系的党员学生和进步学生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制止自卫队扩大镇压的行为。

5月15日，自卫队又包围了迁到小江的廉州中学，要逮捕廉州中学（简称廉中）参加群众大会及请愿的学生。廉中校内的党员学生林富山等知道自卫队包围塘埇角村捕人的情况，事前已有警惕，发现自卫队前来，立即把校门关起来，并动员同学们一起护校。有一个配备武装的校警是共产党员，加上少数护校学生带有手枪，他们作了在必要时以武装护校的准备。在自卫队和护校学生对峙时，学生们高呼“保卫廉中”“反对干涉学校的自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包庇、支持奸商运米资敌”等口号。这时，廉中校长蔡振玮、教师韩朗周（教导主任）、张存芳（训育主任）等出面和自卫队的负责人交涉。自卫队负责人说廉中有学生组织农民暴乱，奉命逮捕这些学生。蔡振玮等则说，学校并无参与农民禁止运米的行为，学校是教学的地方，不能在学校范围内捕人，个别学生在校外的行为，应在校外搜捕，自卫队不能进入学校，为了维护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正常学习，请撤除对学校的包围。在学生严阵以待、强烈反对和学校的严正交涉下，双方对峙了几个小时后，自卫队只好撤走。后来，廉州中学被迫迁回廉州举行期末考试。

自卫队包围廉州中学遭到失败后，便连续几天在小江圩周围的村庄或山区进行搜捕，其目标是捕捉共产党员。由于中共小江区委采取了预防措施，所有党员都注意隐蔽，所以自卫队始终抓不到共产党员。中共小江区委又派与王猷远同族的党员王瑶儒、进步女生王碧儒以及跟王猷远相识的党员易志贤，做王猷远的思想工作及自卫队的瓦解工作。王瑶儒等找王猷远谈话，指出自卫队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小江的农民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只是由于米价飞涨、生活困难，被迫起来向乡公所请愿，得到乡公所的同意后才到南流江边拦截准备外运的大米，制止运米资敌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并不是什么“暴乱”，而镇压群众运动是帮助了日军、奸商和贪官污吏，站到爱国人士和群众的对立面。王瑶儒的母亲是王猷远的长辈，她见到王猷远时也责问他：为什么要带自卫队围攻学校？为什么要逮捕没有犯法的群众？经过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并在舆论的压力下，王猷远的态度稍有变化，不像初来时那样疯狂猖獗，而出现敷衍了事的意向，随后带着自卫队溜回合浦县城了。

被逮捕关押的陈达才和陈仕舟都不是共产党员，两人只是在群众大会上被推举出来讲几句话，没有什么别的行动，国民党当局拿不出任何可以给他们定罪的事实。因此，陈达才和陈仕舟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在小江区委积极找人担保后获释。

至此，小江区人民群众反汪、反逆流、反运米资敌的斗争暂告结束。这次斗争表现了小江人民群众的初步觉醒，小江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获得了经验教训，特别是认识到武装力量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为人民革命事业在小江区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但小江米案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武装镇压群众反运米资敌之运动后，区委书记李秋因害怕而动摇，竟然退党了。

白石水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初，中共白石水区委根据合浦县工委关于反汪、反逆流的指示，首先由白石水区委统战委员张世聪发动群众，联名控告白石水乡乡长梁文光 and 旧州乡乡长吴质平借“抗战”之名，进行征兵勒索、贪污舞弊、横行霸道等罪行，迫使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将梁文光撤职。群众改选了张世聪为乡长，但是县政府不委任，梁文光拒绝不交权，后改选开明绅士韦六吉为白石水乡乡长，朱兰清在旧州参选，被选为旧州乡副乡长。梁文光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与县长李本清暗中勾结，由县政府下令撤销张世聪的白石水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赶走一些进步教师。5月，梁文光等又勾结奸商在白石水抢购大米，用船从武利江外运资敌，牟取暴利。由于他们派人在通往白石水圩的各条路上抢购，大米根本没到市场，致使朝无晚米的贫苦群众断炊挨饿。中共白石水区委根据这种情况，为狠狠打击汪派和奸商，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决定发动群众召开反汪大会和进行请愿，开展反运米资敌斗争。经过充分动员和组织，选定一个圩日，召集武装民兵、各小学师生及农民共2000多人在白石水圩举行反汪大会。中共白石水区委组织委员岑月英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历数梁文光等勾结奸商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运米资敌的罪行，控诉梁文光等压制抗日民主运动、贪污腐化、鱼肉人民的劣迹，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汪派汉奸、卖国贼，禁止运米资敌，平抑米价，保护群众利益。此时，会场上群情鼎沸，抗日反汪的口号响彻白石水街。接着，群众拥至白石水乡公所请愿，乡公所乡丁早已惊慌失措，将大门关闭。请愿代表指名要当时到白石水的县督学谭启元出来答话，谭启元十分惶恐，不敢露面。许久，不得不传出话来，要求群众派代表进入乡公所里与他谈判。当打开大门让岑月英等几个代表进去时，一群武装民兵也乘机闯进去，护卫在代表身边，谭启元及乡公所人员惊恐万状。谭启元一开始就用花言巧语哄骗代表，但代表们不理睬他，并严肃地向他提出要求：①反对无理撤销张世聪的白石水中心小学校长职务。因为张世聪热心办学，成绩显著，宣传抗日，救国救民，有功无过，撤销张世聪的职务是破坏抗战的汉奸卖国行为，坚决要求恢复张世聪的职务；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民主政治，制止一切破坏民主的行为，保障人民抗日救国的权利。②禁止运米资敌，反对囤积居奇，要求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益，严惩奸商非法行为。③实行合理负担，反对借“抗战”之

名贪污舞弊、抓丁拉夫、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代表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把谭启元及乡公所人员质问得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请愿要求合理，表示全部接受。请愿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此后一连几个圩日，武装民兵及群众都到通往白石水圩的各条路口上宣传，并拦截奸商外运的大米，市场粮价迅速下降，群众十分高兴。但是，岑月英在请愿时，谭启元认出她是廉中学生（谭以前在廉中教书时曾教过她），事后，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秘密通缉岑月英，中共合浦县委获悉后，通知白石水区委，安排岑月英隐蔽撤退。

寨圩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5月，中共寨圩特支根据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关于反汪、反逆流的指示，首先开展以下工作：①在合浦简师的师生中组织辩论：“要不要抗日？如何抗日？”通过宣传教育，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②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奸商运米资敌的罪行，动员农民参加反汪斗争。寨圩特支在做好宣传工作后，便发动群众在寨圩召开反对运米资敌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约1000人。寨圩特支宣传委员蒙英翰在会上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如何敲诈勒索农民，欺压群众。谴责地方官僚勾结奸商运米资敌的行为，指出这是米价暴涨，民不聊生的原因。当场有位老汉上台诉苦，说他的房屋被恶霸强占，可是乡长反而助纣为虐，把他的房屋判给恶霸，使他有冤无处申。群众听了老汉的控诉后无比愤慨，纷纷跟着他前往乡公所找反动乡长质问。群众向乡长提出两个要求：①禁止奸商运米出境资敌；②不准任意欺压百姓，要乡长归还老汉的房产。那老汉当面指控反动乡长敲诈勒索、欺压人民的罪行。乡长见势不妙，慌忙躲起来。随后，寨圩群众四处堵截奸商运米出境。不久，反动的寨圩区区长罗光烈却下令不准拦截运出境的米，说谁拦就抓谁，从而把这场群众爱国运动镇压下去了。寨圩的群众运动被镇压后，寨圩特支书记陈业昌离开寨圩。

“合浦米案”历时半年之久，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地区之广，在合浦是史无前例的，标志着合浦革命斗争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合浦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①揭露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某些人搞投降、分裂、倒退的丑恶行径，促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觉醒；②打击了地方官僚和奸商的卖国行径，致使他们运大米、桐油、铜圆等物资资敌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③利用群众的力量平抑了米价，对保障人民最低生活具有一定的作用；④通过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对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⑤这场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群众的经济利益相联系，使群众切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斗争，才能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接受党的领导，为合浦开展农村工作、建立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由于合浦地下党在斗争形式上不够注意隐蔽，到处都采取同一形式，提出同样的政治口号，致使国民党顽固派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组织的，以致一批党员被捕，较多的党员暴露。后来，不得不将一批党员转移，在这种形式下不利于继续开展原地区的斗争。

第四节 北海“三三”事变

1941年3月3日，日军为了继续霸占海南岛和涠洲岛这两个战略要地，加强对北部湾的封锁，以便做好发动太平洋战争出兵占领东南亚在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疯狂地入侵北海。日军侵占北海后，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致使北海地方受蹂躏，人民被残害，造成了北海历史上最为深重的灾难。这就是北海人民蒙受日军的严重侵害北海“三三”事变。

1941年3月1日，日军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并派汽艇抵南满、高德、岭底附近海面游弋，探测北海岸上的军事布防。由于北海防卫空虚，当日军汽艇抵达北海时，市民极为恐慌，连忙疏散。当天中午，北海市民不见日军开枪开炮，便有一部分人返回市区。2日，又有数艘日军汽艇三次抵北海港海面游弋。3日凌晨2时，天气阴冷，并下着蒙蒙细雨，日军又派4艘战舰、10余艘登陆艇和汽艇，突然开到北海港口海面。接着，日军出动1000多人，从高德、岭底、冠头岭附近以及龙皇庙、外沙一带分三路登陆北海。日军先抢占高德，切断北海与合浦的通道，然后向北海挤压夹击。这时，北海的守备力量十分空虚，国民党北海守军一七五师已北撤在钦邕之间抗击日军，驻防北海的只有一个国民党武装自卫中队（队长王光球）共80多人，只有2挺轻机枪和一些七九步枪。此外，还有1个属北海镇政府领导的抗日自卫中队（队长林万里）约80人，武器配备很差。队员是从保甲长中抽调出来的，只作一般军事训练。国民党武装自卫中队分驻外沙龙母庙和珠海中路的龙王庙，他们既没有作战经验又贪生怕死，日军汽艇还未逼近海岸，仅开机枪试探北海驻军实力时，龙母庙的驻军即仓皇开枪还击，兵力虚弱的状况暴露无遗。日军了解情况后，即用猛烈炮火扫射龙母庙驻军，并在高德的沙脚、游泳场两处登陆。龙母庙驻军惊慌失措，由班长带领士兵逃至赵屋岭（今风机厂），与王光球部会合后即向中山公园、福成方向逃遁。而北海警察局、镇政府、抗日自卫中队等兵员，没有统一指挥，更没有作战准备，竟抛下百姓不管，自顾逃命。

从外沙岛登陆的日军，继续追进爱生院（今水厂）。这时，退到赵屋岭的国民党武装自卫中队（只有10多人）被迫向追来的日军开枪，进行自卫。他们发觉日军已作弧形包围后，身为中队长的王光球不但不积极指挥作战，反而束手待擒，结果被击中胸部，当即由士兵用渔笠将他抬着向白屋、龙潭方向逃走。北海市民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纷纷向市郊马栏、横路山、龙潭方向逃避，大部分市民都没有来得及带东西，只随身带一两件衣服，年纪大的索性留在家中东藏西躲。

当天早上9时左右，龙潭党支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安置难民。会议决定：①发动农村群众，做好安排难民的工作（解决他们住宿、粮食和炊具等问题）；②维持治安，将现有各自卫队和联防队联合起来统一指挥，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③设立岗哨，日夜巡逻，

晚上派人深入到中山西路、菜园路、大水沟一带，了解日军的动向，并帮助市民逃出北海市区；④发动开明人士捐粮，捐借被服，使难民暂得温饱。当天晚上，龙潭抗日联防队扩大了放哨范围，并安排张冠均、陈心树分别负责赤江村、横路山村的放哨任务，若发现日军即迅速通报各村群众。龙潭党支部书记王惠澜和党员陈心树潜往北海市区，带领居民疏散到龙潭和横路山一带农村，龙潭党支部则号召村中农民招待疏散到各村庄的居民，解决他们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其中林朗天一家接待的人最多，起了带头作用。

日军在北海登陆后，分别设岗哨在茶亭路、合浦一中和北海村一带，士兵夜宿在珠海路民房，军官宿在军舰上。从3月3日至9日，日军在北海的7天里，从市区街道民房一直到东郊高德沙脚、南郊龙潭村、西郊冠头岭、南满一带，逐家挨户进行烧杀奸淫掳掠。据善后调查统计，北海共有2万至3万斤粮食、2000多只三鸟、300多头生猪、20多头耕牛被日军劫走。有100多人死、伤于日军的刀枪或棍棒皮鞭之下，日军为了抢运物资还拉了50多人当民夫，撤退时又拉了50多人到军舰做劳役。大批妇女、少女被强奸或轮奸；日军还把搜索出来的良家妇女约60人押上军舰供其淫乐，后来这些妇女被放回来时已不足半数。有100多间民房被泼上汽油焚烧，地角、外沙海面一带有几百余艘渔船和货船被日军抢走，还有一大批的商品物资被运走（价值千万元以上），北海各家商号的物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日军对北海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为了“纪念”1936年在北海被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士杀掉的“丸一药房”有间谍行为的中野顺三，日军除了在北海烧杀奸淫掳掠，还组织官兵前往“丸一药房”原址进行追悼祭奠，公开对北海市民作报复性的威胁。

日军按其军事部署，在北海大举扫荡抢劫7天之后，自行撤退。其间，北海市面萧条，人心惶恐，生活无着。面对这种凋零景象，返回市区的中共党员争取到区长潘承奎（合浦专署第五区区长）的同意，成立善后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地下党动员社会青年、学生、教师约40人参加（其中地下党员6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难民进行了善后救济和安顿工作。龙潭党支部也派人参加善后工作，帮助解决居民返回北海的住宿和衣食等急迫问题。